

最后一个夏天

[苏]康·西蒙诺夫著 李如钰 李洁译

最 后 夏 天

【苏】康·西蒙诺夫 著
李如钰 李 浩 译

After the war, the entire crew, as always, went to Moscow to meet the girl, Katerina Efremova. She was a small, thin, peasant girl, but she had been with us since the first meeting. When I met her again at the airfield, I invited her to my plane and talked with her for a long time. After that we often spent evenings together, and this evening was especially good! It was already dark, and we were walking along the village street, a road.

— It's time to go home, Katerina, — I said to the girl. — We have to go now. Our planes are back from the mission. —

Последнее лето

東方出版社

出版说明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距今已经 60 年了。中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主要受害国、参与国和胜利国之一，我国人民和军队为抗击法西斯主义投入了巨大的人力物力，做出了巨大牺牲，最终取得了抗击日本法西斯帝国主义的伟大胜利。

为了记录人类历史上的这场巨大灾难，再现先烈们为抗击法西斯侵略者而谱写的英勇诗篇，纪念这场人类历史上正义战胜邪恶的巨大胜利，我们精选出了反映正义之师英勇抵抗并最终打败法西斯分子的战争小说，编辑成这套战争文学经典重读系列丛书，以此表达我们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60 周年的纪念，对世界各国人民和军队做出的牺牲和取得的胜利的崇高敬意。

丛书第一辑有苏联作家康·西蒙诺夫的战争三部曲《生者与死者》、《军人不是天生的》、《最后一个夏天》和他的另一部长篇《日日夜夜》，肖洛霍夫的《他们为祖国而战》和《一个人的遭遇》，戈尔巴托夫的《不屈的人们》，曾获得“苏联英雄”和“俄罗斯英雄”称号的著名独臂飞行员伊·安·列昂诺夫的自传《独臂长空》，以及讲述在中国流传甚广的女英雄卓娅故事的《丹娘——一个游击队女英雄的故事》。这些书从不同侧面记录和表现了俄苏人民和军队前赴后继、顽强战斗并最终取得胜利的可歌可泣的历史真实和精神风貌，成为反映战争真实、激励后人顽强战胜各种困难的宝贵文献或艺术珍品。希望这套系列丛书的出版能够对中国读者，特别是年轻一代的中国读者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艺术价值和教育价值。

2005 年 3 月

目
录

第一章	1
第二章	18
第三章	39
第四章	65
第五章	89
第六章	106
第七章	129
第八章	157
第九章	175
第十章	202
第十一章	225
第十二章	237
第十三章	260
第十四章	272
第十五章	294
第十六章	309
第十七章	334
第十八章	367
第十九章	449
第二十章	505
第二十一章	550
第二十二章	586

第二十三章	603
第二十四章	619
第二十五章	641
第二十六章	668
第二十七章	688
第二十八章	710
译后记	739



第一章

1944年就像刚过去的1943年一样，是在我军冬季进攻进入白热化后的隆隆炮火声中开始的。一年之前的战争还仅停留在俄罗斯腹地，停留在伏尔加河和顿河流域之间，但现在却向西大大迈进了一步，跨越了第聂伯河，到达了乌克兰的河右地区。

一月底，列宁格勒的包围圈被最终冲破；二月，在克尔苏尼—谢甫琴科夫斯基近郊的低地里德国人被歼十个师。三月和四月，德国人不得不放弃几乎整个乌克兰——乌曼，赫尔松，维尼察，普罗斯库罗夫，卡梅涅茨一波多尔斯克，切尔诺维策，尼古拉耶夫，敖德萨。我军向罗马尼亚北部挺进，解放了克里木，五月初又强攻下塞瓦斯托波尔。

但是所有这些，还只不过是这整个风雨如晦的一年里即将发生的大事的序幕而已。

从四月中旬起，攻势渐渐减弱了。前线部队在完成了自己的作战任务后，纷纷停滞在了春天到达的地带。而在拿下了塞瓦斯托波尔之后，就普遍进入了一段深入而漫长的休整期，以期为新的进攻作准备。

大家既对战果感到满意，又对未来有着某种预感。因为这种预感，因为越来越肯定我们现在已经赢得了对德战争不可扭转的军事胜利，我们越来越感觉到，即将来临的第四个夏天会是战争中最后一个夏天了。不管怎样，就是愿意这样想……

只有体会到这种感觉，才能理解那些恰恰在这一时刻突然因为意外情况离开了战争中心，先是出现在手术台上，然后又躺到了医院病床上的军人们心里，有着怎样的懊丧和焦虑。因为撞在吉普车上导致锁骨骨折和轻微脑震荡，谢尔皮林进了医院，到现在已经在

莫斯科附近的阿尔汉格尔斯克军事疗养院躺了两个多星期了，而且他还要再待上整整十天，等召开了医疗会议后才能重返部队——如果医生们允许的话。

事故发生在离斯图坚涅茨不远的一条通向铁路的大道上，这条大道因为1941年的事至今让人记忆犹新。那时，他拖着一个师的残兵从莫吉廖夫突破，横越克里切夫—奥尔莎铁路，奔向自己的部队；而现在，三年之后，他的集团军在冬季战后，又一次集结到了这个仍然被德国人占领着的地方——莫吉廖夫。

谢尔皮林在这个熟悉的地方巡视了一遍，便往司令部方向返回。忽然前面乘坐着侦察处军官的吉普车在路边一阵打滑，然后车子就碰到了鬼知道什么时候在那里埋下的一颗地雷。

驾驶员忽然打了个急转弯，车子一下撞到了树上。后来，司机来到莫斯科，在司令员身边听候发落，至今他走起路来仍然一副垂头丧气的样子。虽说他当时的反应是正确的，撞到树上也是因为当时正值黑夜，爆炸的亮光晃得他睁不开眼睛。也许，当时如果不是急拐弯，而是刹车的话就会更好些。但谢尔皮林没有这么说，他不愿让对方的心理防线彻底崩溃。他只是暗暗琢磨，回前线后，是否需要换一名司机。发生这一切之后，司机或许会变得过于谨小慎微吧。

从谢尔皮林在去医院的车里清醒过来的那一刻起，他就对所发生的一切感到极度的懊恼。离了他，部队向新的方向进发；离了他，部队得到了扩充；离了他，部队在研究御敌战术准备夏季战役，——而他却一直在治病。右手运动还很不灵活，所以他每天就得在主治医生指导下练习体操。这儿的大夫治疗起来都很认真，因为上级命令：只要有一刻的宁静，在医疗工作中也要把战时这一刻的宁静给利用起来！



整个阿尔汉格尔斯克疗养院里弥漫着一种等待和跃跃欲试的空气。所有的人都在期待夏天。去年的此时，人们也在期待夏天，但是那种期待是混合着焦虑的：德国人还会不会再一次进攻呢？

而这个夏天，人们却是怀着一种满满的信心在等待的：夏天一到，我们就会发动进攻。

在疗养院里除了军人，还有些其他的人也在接受治疗。其中一个是谢尔皮林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起就认识的乌拉尔炮兵工厂厂长。他们厂的反坦克炮发动速度很快，在库尔斯克战役中效果非常好，现在这种炮已经开始在坦克上安装了。这个人虽然好不容易才从一场严重的心脏病里捡回条命，但是谢尔皮林从他的谈话中得知，他也是一直在梦寐以求地念叨着一件事：快点回乌拉尔，回工厂。所有的人都在摩拳擦掌！所有的人都觉得，自己对于前线和后方都是不可或缺的。

在战场上，人们总是待在自己的部队里，接触的也都是自己的战友。而疗养院这儿就像是一个十字路口，汇集了来自各条战线上的人。谢尔皮林甚至已经不再惊奇，他在三个星期里竟然遇到了那么多的熟人。他遇到过一个军事学院的同学，一个实习时的指导老师，一个一起服兵役的战友……这天早上，当他吃过早饭在阿尔汉格尔斯克疗养院的花园散步的时候，忽然听见背后有一个声音：

“费奥多尔·费奥多罗维奇，是你吗？”

他回过身，看见了自己以前的集团军司令员巴丘克。他穿着一件看上去很暖和的红褐色绒晨衣，拖着拖鞋。

尽管剃得很干净的脑袋和黑黑的小胡子看上去很眼熟，但谢尔皮林并没有一下子认出他来，——这是多么令人意想不到的会面啊，而且巴丘克穿着这件红褐色的绒晨衣的样子也让人很不习惯。

斯大林战役后谢尔皮林被斯大林召去了莫斯科。临走前他不知

道自己的命运会如何。当他和巴丘克告别时，巴丘克一副冬天的装束站在吉普车旁：身穿一件短皮袄，头戴一顶毛皮高帽，脚蹬一双细毡靴。这个形象一直留在谢尔皮林记忆中；以后就再也没见过。而现在他竟然穿着晨衣和拖鞋！

“你好啊，伊万·卡皮托内奇！”谢尔皮林终于认出眼前之人就是巴丘克，打着招呼迎了过去。

也许，不仅是谢尔皮林，连巴丘克在他俩拥抱前也感觉到了一丝窘迫。但是拥抱时，巴丘克却出乎意料地把谢尔皮林拥抱了很久。他可能是想借此表明，他并没有为过去的事心存芥蒂。

“嗯，如果这样的话，也不错。”谢尔皮林思量着，又一次庆幸当时正好是不宜飞行的天气，这使他们俩都免于尴尬：巴丘克在谢尔皮林飞来接替他担任集团军司令员职务的前一晚，便坐火车往莫斯科去了。

“我知道你在这儿，”巴丘克说着，松开了谢尔皮林。“昨天我一来就开始了解情况：谁在伤病队里呢？我去看了你一趟，但护士说你去女医生那儿喝茶了。就决定不打搅了。这是你单身汉的私事啊。”

谢尔皮林默不作声。他没有回答。他又看了看巴丘克健康的晒黑了的脸，问道：

“你呢？没在我们的伤病队里吗？”

“老天爷保佑，”巴丘克说，“克里木战役后得了两个星期的假。我的近卫集团军调去当最高统帅部的后备军了，而我呢，就来这里了。暂时由瓦尔福洛梅耶夫参谋长代理我的职务。他和你一样，是军事学院毕业的。但是他指挥才能是没有的，所以不会暗箭伤人。”

“我没有暗算你……这点要弄明白。”谢尔皮林很平静，但他的声音里透出一种警告的意味，阻止了这个话题的继续。



“我是说笑呢！我知道，你没有暗算过我，”巴丘克说，“不然我就不会到处找你了。这花园里的小路可真多……我有确切消息说你还没有结婚，对吗？”

“对。”

“而我正在盼望我的妻子来这儿。飞行员答应今天把她从奥姆斯克送来。”

“很久没见了吧。”

“战争一开始就再没见过。我本想自己去她那儿，可后来又决定让她飞来莫斯科了。儿子现在在前线，还没有孙子。”

“儿子现在在哪儿呢？”谢尔皮林问。他记得，1943年的时候，巴丘克的儿子在列宁格勒附近的炮兵部队服役。

“还在那儿，在卡累利阿地峡。那儿的第二场战争又打响了。还是在我们的南方战线上舒服些！今儿在这儿，明儿在那儿。”

“嗯。”谢尔皮林不肯定地说。他想起了1942年他和巴丘克从顿河向伏尔加河撤退的情景。他想到，那时候究竟哪儿更舒服些，是在列宁格勒还是在他们那儿——在南方，还不知道呢。“是啊……”他沉默了一会儿，又重复道：“现在在南边，当然，更舒服些。”

他想的不是自己，而是战争，但巴丘克看他脸上的神情却以为，他想的是自己，还有自己在沃伦聂什前线牺牲的儿子。

“那时候我和扎哈洛夫想把他调到离你近一点的地方，让他来我们的集团军，”巴丘克说，“但是没来得及。如果能来得及的话，也许他就活到今天了。虽然战争就是这副样子……”

他没把话说完。他们俩都相当清楚，这是场什么样的战争，而要去猜想战争中的人在哪里会安然无恙，在哪里会死去，又是多么的困难。

“我的儿子只受过一次轻伤，就在列宁格勒那儿。躺了一个月，就又归队了，”巴丘克说起了自己的儿子。他紧接着又问：“我们克里木战役的情形你听说了吗？”

谢尔皮林点了点头。对于克里木战役，他知道的和所有关注战争的人一样清楚。在战争进入第四个夏天前解放塞瓦斯托波尔对于他来说就像是未来的一个幸福征兆。他知道，巴丘克的集团军就在克里木担任主攻，但是在刚遇见他的那一刻，也许是因为这件绒晨衣的缘故，他忘了巴丘克不仅因这些战役获得过苏沃洛夫一级勋章，而且还得到过战争中的第一次升迁——他成了上将。这件事一周前各大报纸都报道过。

“祝贺你喜上添喜。”他握着巴丘克的手说。

巴丘克满意地笑了：在克里木取得了一系列的军事胜利后，他终于在战场上得到了他自认为早就该得的地位。

巴丘克现在指挥着近卫集团军，而且获得了苏沃洛夫一级勋章和上将军衔；而谢尔皮林，在斯大林战役之后虽一度在军衔上赶上了巴丘克，但到现在还是一个中将。这一切都让巴丘克觉得自己又成了谢尔皮林的老大哥，虽然他们在职位上同是司令员。他们之间又出现了一段距离，于是巴丘克又可以意气风发地回忆起他们并肩作战的那段时光，那时谢尔皮林还是他的部下。

“你集团军里的家务事处理得怎样？”巴丘克问道，“你接替我以后，换了很多人的吗？”

“我几乎没换，是战争把他们替换下来了。在哈利科夫替下了一批，在库尔斯克又换下了一批。”

他向巴丘克提了几个上级军官的名字，他们有的战死，有的身负重伤，已经回不了集团军了。

“扎哈洛夫还和以前一样是军事委员吗？”



“还是，”谢尔皮林点了点头，“任命了一个莫斯科来的集团军参谋长，某个叫鲍依科的，以前是上校，现在是个少将。”

“他不太得力吧，对吗？”巴丘克感觉到了“某个”这个词里的一种敌意，就问道。

但谢尔皮林用这个字眼并没有什么恶意，他只是出于一种他在沙皇军队里养成的老习惯才这么说。

“恰恰相反，他很得力，”谢尔皮林说，“关于皮金的事，想来你也应该知道吧。通报里提到过他。”

“我读到过了。他把你害苦了，这狗崽子。不过幸好没让你受牵连。”

“是害苦我了，”谢尔皮林表示同意，“不过我不信他是个狗崽子。”

“这有什么不信的？通报里说得很清楚，他揣着军事图被俘了。”

谢尔皮林皱起了眉头。起初，他并不愿回忆这段沉重的历史，在这段历史中他只是侥幸才没受到株连。但他终于克服了自己讳莫如深的心理，把当时的情形坦陈了一遍。1943年3月，在哈利科夫近郊他递交了一份情况说明：他了解皮金，所以他不信皮金会因为飞行员误把“乌—2”型通信飞机降在了德军占领区，就会束手就范，而不把随身携带的军事图毁掉。存在着一种完全相反的可能：他没来得及自杀就落入敌手，恰恰正因为他首先急于销毁地图。

“通报里的说法可不一样。通报里说他是带着作战文件投降的。”

“是的。”谢尔皮林承认道。

“这是德国人自己报道的。我们也是从他们那儿知道的。”

“不错，是这样报道了。”谢尔皮林说，“但是他们也可能是为

了掩盖真相，搅乱我们的计划才这么报道的。既然是一个集团军作战处处长被俘，为什么不就写他带着文件呢？我们难道就没有利用过这种机会捏造过这类事吗？”

“一切都有可能，”巴丘克说，“你为什么不认为他不是偶然迷路的呢？不管你怎么说，他在1930年还被清洗过，那不是毫无缘由的；战争前他还在预备役里待着……”

“我不这么想。我亲眼目睹过他在战场上那么多次的表现，所以我没法这么去想。”

“无论如何，他还是把你害苦了，”巴丘克说，“你太急于把他召到作战处来了。”

“这话不错，是太心急了。”

然后，他们俩不作声地并肩走了一两分钟，两个人都感到了沉默背后的隔阂。巴丘克心中突然涌起了一股对于旧事的怒气，他感到谢尔皮林还是和以前一样自命不凡，“我知道”，“我看不见”，“我不允许”……一直“我”啊“我”的。他内心里还跟从前一样认为自己比所有人都智慧。

而谢尔皮林一边走，一边想着自己和皮金：“我过去相信他，以后还会继续相信他，我这么做是对的。至于我刚接管部队，就立刻把皮金调来当作战处处长——这确实草率了。司令员刚来，我还不熟悉他，所以就想在身边安插自己的人，这表现出一种偏袒，更准确地说，是一种弱点。这是我自酿的苦酒啊。皮金在师部待着正合适，而作战处就会让他为一大堆事儿手忙脚乱了，更何况哈利科夫的状况还这么意想不到的糟糕。皮金由于疏忽，没能及时向两个师传达撤退的指令，然后当通信完全中断的时候，便一再要求飞去亲自挽救局面。”而谢尔皮林竟然同意了，结果却害苦了自己。

后来有人想要因此而苛责谢尔皮林。可最后通报里竟然连一句



责备他的话都没有。谢尔皮林至今也没完全弄明白这是怎么回事。当然，扎哈洛夫作为军事委员，凭自己一贯的不卑不亢的作风，向前线写了封信，阐明了自己的意见，这件事也是起了一定作用的。但是仅凭这一点还不够。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谢尔皮林已经不止一次想到过这层，——如果把这件事上报到最高当局莫斯科，由于斯大林刚刚才将谢尔皮林擢升为司令员，所以他不可能立即改变决定，也不可能允许马上就把谢尔皮林给撤下来。但是，毫无疑问，必定有人建议过撤换谢尔皮林。因为在这件事上，谢尔皮林的责任很大。仅凭他对皮金的信任来为自己开脱是不行的，但是，除了信任，就再也没有别的可以支撑谢尔皮林的证据了。

“还记得巴拉班诺夫吗？”巴丘克突然问。

“记得。”谢尔皮林说着，抬眼看他。

谢尔皮林从巴丘克的问话里听出一种挑衅的味道。但这么想其实是多余的：巴丘克不过是回忆起了一个曾经像皮金欺骗谢尔皮林一样害了自己的人；虽然他们采用的是不同的方式。

“他去年夏天给我写了封信。他出院后，请求我原谅他以前对我的胡作非为。他理解我的为人，知道我会再要他的。”

“那你让他回来了吗？”

“让他回来了。他卑躬屈膝地到前线来找我，当时他成了上尉，——由于企图自杀他被连降两级。可现在又是上校了。”

“是副官吗？”

“是副官。他请求去侦察队，但我把他留在自己身边了。习惯了。你信吗，我还挺想他的，他是个不错的副官。”

“也许吧，”谢尔皮林说，“若非当时你硬逼我派他当团长，你也不会挂念他，而他也不会开枪自杀。”

巴丘克认真地看了一眼谢尔皮林，好像突然在他身上看到了一

种他早已忘却的东西。

“嗯，我看出来了，我和你是没法互相谅解的。你以为我不知道你们是怎么说我的？你们说我急躁，只要谁惹我生气，我就能给他一顿臭骂，然后弄得自己也不高兴。但我火气大，气消的也快。而你，虽然表面温和，实际却厉害得很，就像床铺的软，却让人睡不舒服。一旦谁妨碍了你，他就甭想得到你的原谅了。”

“他妨碍的不是我，伊万·卡皮托内奇，是事业，”谢尔皮林用巴丘克所熟悉的那种平稳的让人心惊的声音说着，这也就是巴丘克所谓的“床铺的软”的意思。“难道你到现在还不同意，他不能指挥一个团吗？”

“可以说能，也可以说不能！如果他不喝酒的话，他本来是可以的。他现在已经十个月滴酒不沾了。”

“哦，这样的话，那现在他可以指挥一个师了。”谢尔皮林笑了，笑声让他话里的实质显得不那么尖锐。

“你怎么样，还和以前一样喝一点吗？”巴丘克问，“要不就是健康已经不允许了？”

“出了事故后就戒了。他们说我毕竟是受过脑震荡的人。在这以前倒还是喝着从前的量。晚上签完最后一份文件，就在睡前再喝上半杯。”

“头撞得厉害吗？”

“不记得了。据说是地前飞了有五米。”

“我不喜欢这些吉普车，”巴丘克说，“离了它们不行，但还是不喜欢。这是种危险的车。我听说我的前任坐着吉普车在前沿阵地误入了德国鬼子那边，结果迎头挨了机枪的一顿扫射！”

“这和吉普车未必有什么关系吧。”谢尔皮林反对道。

“怎么没关系？”巴丘克嚷起来，“他飞快地驾驶着车子，连守



卫都没有追上他。据说他是个聪明人，但在这事上玩过了火。他赶紧后退，但为时已晚！胸口中了12颗子弹。于是就像人们说的那样，他被除了名，而我就顶替了他。然后我就和他留下的班子一起并肩作战。一个人也没换……塔夫里雅和克里木的酸牛奶很不错。还在国内战争的时候，我就记住了这种酸牛奶。我一到集团军，就立刻要人早晚都给我供应酸牛奶。”

谢尔皮林笑了笑。他记起，以前在军事委员会食堂吃饭的时候，总要为巴丘克把牛奶泡酸，雷打不动。巴丘克除了情绪高涨的时候外，很少喝酒。而且即使喝了酒，晚上还是会用勺大口大口地喝着自己的酸奶。

战争中，每当巴丘克怒红了脸，很多人总觉得那必然不会是平白无故的，他发火一定有很重大的原因。可实际上巴丘克并没有什么原因，他的大叫大嚷，他尽情放纵自己的脾气都是出于他老早就有的一个百折不挠的信念，也就是他这么做都是为了事业的利益。

“是的，”谢尔皮林想到，“要是能看看他在前线的样子就好了，现在的他是什么样的呢。他变了多少，又在哪里变了呢？他动不动就不遗余力地给人一顿臭骂的习惯现在越来越行不通了。可让他发脾气的理由少了，因为秩序变稳固了。而且官兵们也比以前更强烈地抵制这种方式。仗打得越久，他们心里的罪恶感就越轻，而骄傲就越多。归根结底，还是由于仗打的出色多了啊。”

而巴丘克仿佛是顺应着谢尔皮林的思绪，说了本质上相同的话：

“当我们走在克里木的时候，有时往草原看一眼，就能看见遍地散乱的尸骨。那些是1941年留下来的吧，尸骨已经变白了。你只要一想起我们曾经承受过的一切，就会觉得人是很值得惊奇的：那时候他们究竟是怎么经受住这些的呢？然后你也会对自己感到惊

讶：在发生了所有这些之后，你怎么还能活下来呢？看看这些白骨，你会想：那时候有谁没有责骂过他们这些可怜的人，也责骂自己呢，就因为他们从这里撤退了或者在那里失守了！……而现在呢，难道不是又想让他们复活，又想拥抱他们吗，可是连一个人也没有……我昨天在莫斯科，人家告诉我一个新的培训计划：从这个秋天起学校就要单独地培养男青年了。听说了吗？”

“好像有这么回事。”谢尔皮林说。

他已经听说了分开教学的事。他觉得如果男孩和女孩能分开学习的话，这对应征前训练是有好处的，也就是说，是会对军队有利的。1941年的痛还在触碰着记忆：那时有多少人一离开学校的长椅便直接应征入伍并且准备献出自己的生命啊；但是他们又是那么缺乏军事训练，简直笨拙得让人恼恨！

“你对这个问题怎么看？”巴丘克问道。

“我很高兴作出了这么一个决定。”

“是啊，那些年轻人，”巴丘克说，“战争初期他们让我们尝了不少的苦啊。”

“为什么不是我们让他们呢？”谢尔皮林自己也没料到突然会这么发问，因为刚才他和巴丘克的想法似乎是一致的。

“上将同志，您该去做X光了，要不就该迟到了！”

他们俩转过了身。

护士追上了他们，在他们面前站定，因为收不住脚差点撞上他们而面露窘态。她很年轻，身材高大，脸颊和脖颈泛出玫瑰红。

“啊，是该去了，”巴丘克说着，挽起了晨衣的袖口，“瞧你像坦克一样地冲了过来……”

他朝她打量了一眼，狭窄的护士袍里紧紧包裹着她年轻而丰硕的躯体，然后他带着某种既包含着善意又显得粗鲁的莫名其妙的感

